

夏家善 主编 | 王宗志 夏春田 注释

· 中国历代家训丛书 ·

帝王家训

国之匡辅，必待忠良；
任使得人，天下自治。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中国历代家训丛书

夏家善◎主编

帝王家训

王宗志 夏春田◎注释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王家训 / 夏家善主编 ; 王宗志, 夏春田注释.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8

(中国历代家训丛书)

ISBN 978 - 7 - 5528 - 0512 - 3

I. ①帝… II. ①夏… ②王… ③夏… III. ①家庭道德 - 中国 - 古代 IV. ①B8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3496 号

帝王家训

夏家善主编;王宗志 夏春田注释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91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92 千字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28 - 0512 - 3 定价:30.00 元

序

我国古代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品类繁多。其中，各种形式的“家训”“家诫”“家规”“家礼”，在普及传统文化、规范人们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整齐家风以至维持整个社会的谐调稳定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很值得重视。

“三代而下，教详于家。”清代学者钱大昕这句话，概括地说明了我国古代具有重视家教的传统。“家训”“家诫”一类著作，起源于东汉而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它是当时世族社会教育制度的产物。人们十分熟悉的诸葛亮的《诫子书》，即产生于汉魏之际；而最早系统编撰成书的家训著作，当推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作者撰写该书的直接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而其更深远的意义则是为了“轨物范世”“遗泽后昆”。这类著作以家族和家庭中长辈对晚辈耳提面命的谆谆教谕的形式，将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儒家文化精神通俗地灌输传授给子孙后代，使其“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即利用血亲伦常关系和长辈对晚辈的绝对影响力约束力，达到“助人君，明教化”的目的。各种家训中有关立志、勉学、修身养性、待人接物的训诫，无非是要求“养亲事君忠孝为本”“言则

忠信行则笃敬”“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以维持世族的社会地位。这种家教的传统之所以在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影响到近现代，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正如梁启超所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家族宗法制度的客观存在和历久不衰，就为家教传统的延续和“家训”一类著作的蓄衍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土壤。被视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一书问世后，曾辗转流布，反复梓刻，虽历千余年而不佚，存其影响示范之下，各种形式的家训、家教、家规、家约、治家格言之类著作层出不穷，无代无之。如若将这类著作加以汇集，恐怕有数百千家之多，显然这是一笔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从文化的视角来审察，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其内容丰富而芜杂，但总的来说，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儒家文化。受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历代家训也深深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透过其或典雅精微或通俗易懂的言辞，其着力宣传之要旨大抵不外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立人”“达人”“爱人”“谅人”的“忠恕之道”，以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的“絜矩之道”。也就是说，儒家所倡导的文化价值观念、理想人格模式和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历代家训的主要精神支柱，是“儒者宣而明之”欲使其“家至而户说”的基本内容。当然，受释道思想文化的影响，古代家训中也夹杂着若干儒家文化以外的其他思想成分或因素，如道家之“无为”，佛家之心性修养等等，这也完全是事实。家训作为在历史上产生和发展的文化现象，它也不可能不带有其所经历的各个时代的烙印，但从实质和总体上来看，它还是以儒家的忠孝仁义为

本，吸纳融汇某些佛道思想，不过是作为达到忠孝仁义的手段而已。

显然，就思想内容而言，历代家训并非如前人所夸誉的那样，是“篇篇药石，言言龟鉴”，但它也绝不是一堆粪土，不是一堆完全有害无益的封建糟粕。对于家训这种既包含着糟粕，又包含着许多人生智慧和真、善、美的启示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像对待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一样，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和批判继承的态度。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作为完整的结构，都可以分解为不同的层面，每一层面又可以分解为若干要素；换言之，文化要素构成文化层面，文化层面构成文化系统。对它们是可以加以分析分解的，也可以根据新时代的需要进行重组或新的综合。我们对待历代家训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区别良莠，批判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改造继承吸收其富有生命力的或在今天仍有启迪借鉴意义的文化内容，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

既然古代家训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大多出自历代帝王、名臣仕宦、封建士大夫之手，而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倡导，它就不可能不带有封建地主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不可能不大量宣扬封建道德观念。例如，历代家训中反复强调必须遵从封建的纲常名教，倡导愚忠愚孝的封建伦理道德；反复鼓吹“学而优则仕”“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士大夫观念；反复提倡安常处顺、知足常乐、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和保守思想，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都属于封建思想的糟粕，是应该批判和舍弃的。这方面的思想流毒在今天仍不能忽视。

另一方面，历代家训中还包含着相当多的思想精华和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在教育后代如何处世做人的论训中，提供

了前人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智慧，自觉或不自觉地宣传和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富有生命力的内容，都可供我们发现剔抉、含英咀华和借鉴吸收。从大的方面来说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其一，鼓励立志。如诸葛亮《诫外甥书》说：“夫志当存高远，……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窞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温氏母训》说：“岂有子孙专靠父祖过活之理！……若肯立志，大小自成结果。”

其二，奖掖进学。如诸葛亮《诫子书》说：“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颜氏家训》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

其三，劝勉勤俭。《朱柏庐治家格言》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明吴麟徵《家诫要言》说：“治家，舍节俭别无可经营。”“茹荼历辛，自是儒生本色。”

其四，提倡清廉。《景氏家训》载胡康公诲诸子曰：“予居官四十余年，无他长，但‘清白’二字，平生守之不失。尔曹今日虽未有官守，务全名节，金帛易动人，远而勿亲。”高攀龙《家训》说：“世间惟财色二者，最迷惑人，最败坏人。”

其五，导人行善。《朱柏庐治家格言》说：“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家诫要言》说：“待人要宽和，世事要练习。”“恶不在大，心术一坏，即入祸门。”《弟子规》说：“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能亲仁，无限好，德日进，过日少。”

此外，历代家训还在强调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应世涉务，分阴惜时，遵守礼仪，尊敬师长，孝顺父母，慎择朋友，睦邻友

好，克己让人等许多方面，都有一些精彩的议论和非凡的识见，有的至今仍能给人以真的启迪、善的奉劝和美的鉴赏，展示出永久的价值和魅力。这些积极的内容自然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须继承和发扬的。经过批判的分析和创造性的转化，完全可以用来作为对青少年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有益资粮和历史教材，倡导良好的家风亦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协调发展。

《中国历代家训丛书》的主编夏家善同志，是我刚调到南开大学工作时就已相识的老朋友。他长期研治中国文学，详熟古代文化典籍，特别瞩目于历代家训的搜集整理，用力甚勤，颇有心得。这套丛书就是他从我国历代家训中精选汇编出来的，共计十二册，虽分类汇编而又构成一完整系统，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并邀请专家学者对各书分别加以标点、注释和说明，以便于读者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内容，从中汲取智慧和涵养。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夏家善同志向我征序，作为老朋友，我觉得难以拒绝，于匆忙中写了上述粗浅的认识，不当之处请编者和读者批评指正。

方克立

前 言

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封建帝王在封建社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因此，他们的思想影响也就更大。帝王家训作为帝王思想的组成部分，其影响当然是那个时代任何人的家训著作所不可比拟的，因此是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家训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资料之一。

虽然历代帝王均不乏家训，但是以文字形式流传下来的却并不很多。本书限于篇幅，只选录了上起西周、下迄清代十位帝王的家训。其中有的朝代因资料匮乏，只能付之阙如。

这十位帝王的家训，唐太宗的《帝范》、清康熙帝的《庭训格言》和雍正帝辑撰的《圣谕广训》是三部完整的家训，其余则都是从有关典籍中辑录的。这些家训大体上反映了我国帝王家训的面貌，其思想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少帝王认识到江山失易得难、事业成迟败速的规律，在家训中明确了一些“为人上者”的基本原则：①从政要敬慎戒惧，绝不可沉湎于吃喝玩乐之中。对政事更不可怠忽，要居安思危，“于无事时，常如有事而防范其未然”（《庭训格言》）。②要站得高，看得远；胸襟宜宽，度量要大，即“宽大其志，足以兼

包”（《帝范》），这样才不至于为一些具体事情所困扰。③对下（包括将相等大官吏）要威慈并施，使之尽心竭力而不敢妄为，怀德怀仁而自觉尽忠。关于这一点，李世民概括得极为简洁：“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④对自己要“平正其心”；对大臣要“接之以礼”；对九族要“抚之以仁”。这样才可能避免上下离心、左右离德，以至“身亡国灭”的下场（《帝范》）。刘邦更告诫太子，对有功老臣要格外尊重，对“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敕太子》）。这在帝王至上、皇族至尊的封建王朝是难能可贵的。这恐怕也是汉王朝延祚较久的原因之一。

二、“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只有得人，才有国有君。而得人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能让人民得以温饱存活。历代有为的帝王几乎都认识到“食为民天，农为政本”，而把“重农桑”作为基本国策。其意义在于“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乏则忘廉耻”。衣食是施仁教化进行思想统治的物质基础。这是因为，没有最起码的物质基础，精神的东西则无所依附。因此，提出“地方文武官僚，俱有劝课之责”，要求他们“勿夺民时，勿妨民事”，对百姓“浮惰者惩之，勤苦者劳（奖励）之”。希望出现“野无旷土，邑无游民，农无舍耒耜，妇无休其蚕织”的局面（《圣谕广训》），从而铲除“贫穷生盗心”的土壤。

三、戒奢崇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俭以成廉，侈以成贪，这不但是生活作风问题，而且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所以历代帝王每每将此作为家训的重要内容提出。隋文帝杨坚在总结前代教训时告诫太子：“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能长久者。”这是因为，为君者“极其骄奢，恣其嗜欲”，必然导致“徭役繁”“赋敛重”；而贫富差距的拉大则导致“人神愤怒，上

下乖离，佚乐未终而倾危已至”（《帝范》）。因此有人提出“与其寡廉，孰如寡欲”的主张，并指出为人君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庭训格言》）。有的注意到了皇族生活方式对百官僚属的影响。赵匡胤见公主“贴绣铺翠襦”并满不在乎，因此指出：“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寝广，实汝之由……岂可造此恶端？”（《戒公主崇俭》）

对于一般的人，“骄出于志，不节则志倾；欲生于心，不遏则身丧”。对于帝王，则关系到国运福基，“桀纣肆情而祸结，尧舜约己而福延”（《帝范》）。这些上行下效的史实给人的教训极深，在今天也仍有借鉴意义。

四、求贤纳谏、去谗摒谏，也是帝王家训的重要内容。王者“高居深视”，他们既有广搜贤才为己所用的条件，又有被奸邪小人包围而耳塞目盲的可能。因此，求贤纳谏，去谗摒谏，就成了历代帝王取得政权、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

要纳谏，首先要求贤，即网罗天下人才，从而使人君有可能“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心思为心思”（《庭训格言》），从而广闻见、深思虑。对其重要性，李世民谈得更为具体：“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这就像“舟航之绝海也，必假舟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人才的价值是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比拟的：“照车（宝珠）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在用人的原则上他也有一套明确的提法；因为每个人都“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所以在使用上要扬长避短，以使人尽其才：“知者用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在识人上要全面：“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在赏罚上强调“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

之”，从而以对一人的公开奖惩，达到教育、劝化众人的目的，使威立化行，所谓“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另外，纳谏的面要宽，采纳与否的标准要一致，不可因人废言：“言之而是，虽在仆隶皂莒，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将相，未必可容。”（《帝范》）

与纳谏关系密切的是去谗。那些谗佞之徒，为了“争荣华”“竞势力”，采取“巧言令色”“先意承旨”的手段“以亲于上”“以悦于君”。如果不能拒谗摒谗，则会使奸邪小人得逞，从谗之暗主则会导致“败德败正”的严重后果。因此，纳谏与从谗成了明君与暗主的重要区分：“明主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谗，命因甘而致殒。”（《帝范》）赵光义更引先贤之言敦劝子弟：“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这虽未免有些绝对化，给一些沽名钓誉之徒留有可乘之机，但从中也可看出他们对纳谏与去谗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五、崇文讲武，文武兼用。武装夺取政权是封建社会中最常用的改朝换代的方式。历朝的帝王们大都认识到了武备的重要：“不教人战，是谓弃之。”但是，他们又认识到，虽然不可弃武，但也绝不可好战。“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好战则人雕”“亟战则人殆”。武备“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帝范》）。就连马上得天下且生平不喜儒者的刘邦，“践祚以来”也认识到单靠武力不能夺取政权，更不能巩固政权的道理。以自己的经验“追昔所行，多不是”，而告诫太子刘盈。关于讲武与崇文的关系，李世民有过简明的概括：“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夺取政权如果更多地是靠武功的话，巩固政权则更多地是靠文治。因此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功成设乐，治定制礼”几乎

成了规律。这是因为“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帝范》）。他们认为，在当时以儒为本而兴教化、导民俗，是统一民心、巩固政权最有效的办法。

与崇文紧密联系的是兴学与读书。关于兴学的广泛意义，《圣谕广训》明确指出：“勿谓学校之设止以为士，各宜以善相劝，以过相规。向风慕义，勉为良善，则氓之蚩蚩亦可以礼义为耕耘，赳赳武夫亦可以为甲冑。”从而把兴学讲礼看成了对全民进行思想教育的组成部分。当然，其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其封建统治。

关于读书的方法，有不少论述在今天看来也是有参考意义的。如：“凡看书，不可为书所愚。”（《庭训格言》）这是在提倡独立思考。“当读书时，须要体认世务；而应事时，又当据书理而审其事宜。”（《庭训格言》）这其中透露着学与用、用与学的辩证关系。

六、家训教育的重要性，历代帝王都有充分的认识并在行动中有所体现，就是在理论上也有所建树，尤其强调要身教言教，并且从童蒙时抓起。关于这一点，在《圣谕广训·训子弟以禁非为》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他认为，“大凡子弟之率不谨，皆由父兄之教不先”。父兄的身教言教都极为重要，“以身教之，耳提面命；以言教之，使子弟见闻口熟”。强调从年幼时抓起是因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这比坏习惯养成之后再加以纠正要好得多。“与其追悔于事后，孰若严训于平时？”因此提出了这样的命题：“义方之教，切磋之功，可不豫严于蒙稚之年乎？”

历代帝王家训确实不乏精彩之处，其中的某些内容在今天看来也还有借鉴作用。但是，他们撰写家训的直接目的在于训诫他们的子孙后代，让他们恪守训条以完善自身，求得家天下的“江

山永固”；有的则以家训的形式颁行天下，作为对“金体兵民”进行思想统治的工具，这在《圣谕广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另外，像李世民在当时主张“封建”（分封亲属，建立邦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对历史的反动，这就不仅仅是时代的局限了。至于上智下愚、纲常伦理、劳心者治人之类的封建地主阶级思想，虽然在一般家训中也都存在，但在帝王家训中更为突出。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这些撰著时所应该注意剔除的封建性糟粕。

王宗志

目 录

戒书	[西周]姬发(1)
敕太子	[汉]刘邦(4)
遗诏敕后主	[三国]刘备(8)
诫当阳公	[南北朝]萧纲(12)
诫太子勇	[隋]杨坚(14)
帝范	[唐]李世民(16)
序	(16)
君体篇	(22)
建亲篇	(23)
求贤篇	(28)
审官篇	(31)
纳谏篇	(34)
去谗篇	(37)
诫盈篇	(39)
崇俭篇	(40)
赏罚篇	(42)
务农篇	(44)
阅武篇	(46)

崇文篇	(48)
后序	(51)
戒公主崇俭	[宋]赵匡胤(54)
敦劝皇属	[宋]赵光义(56)
庭训格言	[清]爱新觉罗·玄烨(58)
圣谕广训	[清]爱新觉罗·胤禛(189)
序	(189)
敦孝弟以重人伦	(191)
笃宗族以昭雍睦	(195)
和乡党以息争讼	(198)
重农桑以足衣食	(201)
尚节俭以惜财用	(204)
隆学校以端士习	(207)
黜异端以崇正学	(210)
讲法律以儆愚顽	(214)
明礼让以厚风俗	(218)
务本业以定民志	(221)
训子弟以禁非为	(225)
息诬告以全善良	(228)
诫匿逃以免株连	(232)
完钱粮以省催科	(235)
联保甲以弭盗贼	(239)
解仇忿以重身命	(242)
后记	(246)

戒 书^[1]

[西周] 姬发^[2]

师尚父道书之言曰^[3]：“敬胜怠者吉^[4]，怠胜敬者灭^[5]；义胜欲者从^[6]，欲胜义者凶^[7]。”王闻书之言^[8]，恐惧退而为戒焉^[9]。为席前左端之铭曰^[10]：“安乐必敬^[11]。”前右端之铭曰：“无行可悔^[12]。”鉴之铭曰^[13]：“见尔前，虑尔后^[14]。”盘之铭曰^[15]：“与其溺于人^[16]，宁溺于渊^[17]。溺于渊，犹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铭曰^[18]：“毋曰胡残，其祸将然；毋曰胡害，其祸将大；毋曰胡伤，其祸将长^[19]。”剑之铭曰：“带之以服，动必行德^[20]。行德则兴；背德则崩^[21]。”矛之铭曰：“造矛造矛，少间弗忍^[22]。终身之羞，予一人所闻^[23]。”以戒后世子孙。

注释

[1] 戒书：周武王姬发登皇帝位的第三天，召请师尚父姜尚，询问有没有可以使子孙万世永远享用不尽的东西。姜尚作了回答。周武王据此写下了若干铭文，别人又据此写下了这篇《戒书》，作为对后世子孙的警戒。

[2] 姬发：西周王朝的建立者。姬姓，名发。继承其父文王的遗志，联合庸、蜀、羌、玁狁、微、卢、彭、濮等